

浅谈延安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的

□ 监利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陕甘宁边区既是属于国民政府统一管辖的一个行政区(相当于一个省的建制),又是一个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特区”。我们习惯地称之为延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建成了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是全国在政治上最先进的地方。同时,延安也是全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模范区。在延安时期(1935—1948年),形成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崇廉耻贪的社会风气。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上说:“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最先进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污官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鸦片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7页)这个十没有是延安艰苦奋斗、务实为民、清正廉明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尚的真实写照。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延安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很多经验熠熠生辉,是新时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生动教材,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第一,开展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党员干部勤政廉政的核心问题,也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只有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才能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远离腐败。延安时期始终坚持对党员干部,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毛泽东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述。其中“老三篇”,堪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圣经”。第一篇是《为人民服务》,他在文章中提出为人民服务要做到“完全”“彻底”。第二篇是《纪念白求恩》,他在文章中提出为人民服务要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第三篇是

《愚公移山》,他在文章中提出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生命不息,挖山不止,“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号召中国共产党人不论能力的大小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延安时期开展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为廉政文化指明了方向,从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上构建了廉政文化建设的格局、大氛围,从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培育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宗旨是行动的指南,作风是宗旨的践行。廉政文化建设的关是要提高党员干部思想上的自觉性和行为上的自律性,形成良好的作风。1941年到1943年,延安开展了一次全党范围的大规模整风运动,其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就是要通过整风运动整掉那些腐败的坏毛病。通过整风运动,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反对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刘少奇发表了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加强党性锻炼,严格要求自己。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慎独”,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自觉地从思想上行动上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三大优良作风形成,净化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全党反腐倡廉的自觉性,形成了革命队伍内部良好的风尚。凡是到过延安的外地人士,都亲身感受到延安蓬勃向上的,充满活力的正能量,从延安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第三,建立了各项制度和法规。廉政文化的制度建设是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一种自觉,但又是党对每个党员干部强制性的要求。延安时期,党中央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

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反贪污法律法规。建立了财政收支及资产管理、财务人员监管及决算制度、财政审计制度等财政监管制度;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等干部廉政制度,形成了延安时期一整套的廉政法规制度体系。制度法规一旦形成,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没有“特殊人物”。陈云说:“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毛泽东说:“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甘泉县县长路思温挪用公款达220元,严令交待,以正吏治。甘泉县张家坪税务局长肖玉璧,1933年参加革命,在任内贪污公款3050元,1942年被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的队长,15岁参加红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当过团政委,追求正在延安陕北大学读书的女学生刘茜,逼婚不成,1937年10月5日在延河边开枪打死刘茜。10月11日,边区法院召开公审大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

第四,建立了“内外夹攻”的民主监督体系。不受监督的政府,势必走向腐败。1945年夏天,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延安考察,很赞赏共产党人积极进取,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同时,他对毛泽东提出一个“周期律”问题。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粗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来

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延安时期为使共产党永远保持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创建良性的廉政文化的氛围,建立起了党内监督、参议会监督、政府内部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党外人士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七个方面的“内外夹攻”机制,真正建立起一套“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全方位、多渠道的民主监督体系,成为反腐护廉的铜墙铁壁。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共产党人与外人的关系的决定(草案)》,指出:“任何愿意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士,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力”,“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绝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士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者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错缄口不语的现象。”党的报刊上也设立了批评专栏,通过批评媒介,接受群众的监督。设立了边区参议会,作为民主监督机关,对政府工作进行批评。

第五,领导干部带头,以身作则。延安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领导做出了表率。特别是党的领袖人物个个都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模范。全社会向党看齐,全党向党看齐,为廉政文化提供了发展动力,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毛泽东穿着双膝部位打着大补丁的裤子去抗大讲课。有一次延安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去毛泽东住的窑洞汇报工作,见毛泽东坐在炕上,假在被子下办公,问毛泽东是不是病了。毛泽东说,我的棉裤洗了,在外面晒着,没有裤子穿,不能起身迎接你。肖劲光很心酸,延安再穷,也不少毛主席一条棉裤。他说,我走后勤处领一条来给主席。毛泽东说,你能不能给每个八路军战士都补发一条棉裤。肖劲光说,不能。毛泽东说,既然每个战士不能补发一条

棉裤,那我毛泽东也不能例外。毛泽东就是这样不搞特殊化,不多占一丝一毫,与战士同甘共苦。朱德在王家坪住地开荒种菜,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朱总司令在总司令部里的灯光下工作到深夜,可是每到早晨,又看见他像农民一样,下地干活。周恩来没有办公桌,一块用高粱秸秆编成的桌面就是他批阅文件的地方。延安著名的“五老”之一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当时已经53岁了,他当官没有一点官架子,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亲自参加劳动,基本做到自给自足。他勤俭节约,滴漏归公。1943年,他定了个人生产规划:生产粮食交粮食局,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不吸外来纸烟,不要公家供给棉衣、衬衣、鞋袜、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他曾作诗自勉:“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泊生涯一亩(注:种烟叶)公粮交,糖萝卜二分私费。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日如新不花钱。”在林老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影响下,边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人们称边区政府,“只见公仆,不见官”。

在领导以身作则则廉洁奉公的同时,在干部中树立廉洁奉公的先进楷模,发挥先进典型人物的带动作用。加大社会环境的治理力度,改造民间陋习,整治赌博、吸毒等不良社会风气,为廉政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社会环境。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一些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的面貌焕然一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回顾延安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凝聚党心,振奋民心,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

独特形式的成人教育——监利县乡干部扫盲班

□ 匡计洪

【题记】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也是我在党65周年,学习党的百年史,我心潮起伏;回顾65年我走过的道路感慨万千,激励我奋笔撰写与修改,在党的领导下,我和教育同仁们在那峥嵘岁月所亲身经历的那些艰难曲折而又富有创意的往事,以资纪念与庆贺。

1955年冬,根据上级有关精神和革命与建设的需要,县委在县城开办了“监利县乡干部扫盲班”,计划用两年时间,采取轮流离职、分期分批的办法,扫除全县区乡主要干部中600多名文盲。预计分七期扫完,每期3个班90人,时间4个月。校址选用原县扫盲办公室旧址(即杨家湾,现干休所),扫盲班由县委组织部和县文教科双领导。扫盲班成立党总支,由组织部一名副部长兼任书记,副书记为南下干部、曾任白螺区委书记、时为县妇联主任甄素琴。她一面加强学习,一面参加学习。县文教科负责业务指导和办班经费。工作人员编制列入县委,工作证、医疗证都由人委会发放。扫盲班主任原县委办公室政研员夏寅,专职文化教员有预备党员、朱河镇扫盲大校长孙秉文,县扫盲办公室业务骨干郑学新,我是第三个被挑选的。我当时任毛市区中心小学校长,毫无思想准备,加之对扫盲业务不熟,担心难胜任此任。时任县文教科长文德芳对我说:“扫盲班学员都是区乡脱产的主要干部,还有少量县直部门领导,几乎都是党员,要教好他们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除了文化业务水平外,很重要一点要有组织能力、负责精神和一定的工农感情。你参加过土改,后在几个地方工作都不错,相信你能做好这项工作的。”经他这样开导,我再也没说二话,便拿着介绍信到扫盲班报到。我便由从事普通教育而转向投身成人教育。当时校舍紧缺,我们同乘文同志住在不到九平方的小

房间,同睡一个铺位。

夏寅告诉我,学员早已入学,经过测验按识字多少分为甲、乙、丙三个班。甲班是半文盲,丙班是纯文盲,有的虽然是区干部、乡干,几乎不识字。要通过四个月的学习,使他们能识2000字以上,能读通俗书报,写简单的条据、书信、发言提纲、工作总结与请示报告,任务十分艰巨。我虽教过几年书,对这个领域完全是陌生的,好在教五年一贯制实验班前,到县培训学习过“速成识字法”。

第二天,我刚上班,带的便是最难教的纯文盲班。当学员得知我是毛市小学调来的,都很高兴。我和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后,与其说是我教他们,倒不如说是他们教育了我。他们政治上翻身,迫切要求在文化上翻身,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难教。他们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也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和四十岁以上中年人。他们接受知识快,但记忆力差。于是我先教给他们识字的方法,即拼音字母,按音序集中识字。然后利用汉字的特点,分偏旁部首区别字、组词、列反义词等多种应用文,指导写话和各种条据。他们文字基础差,却非常自觉刻苦,有着顽强的毅力。许多学员就寝后,躺在被窝里在自己身上默字。有的做梦都在背书。连笔都不会拿的人,到后期,字练得一天比一天好。县委一位秘书一天到班上看了学员写的字,高兴地称赞这相当于初中学生的书法。他们对老师也十分尊敬。当他们学了毛泽东同志给徐老七十大寿辰的祝词后,多数同志都能背出其中的一些句子,并用来自称贺词。当他们掌握常用字后稍加训练,基本上能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出来。他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纯朴的感情。学会写信后,第一封信就是向各级党委汇报学习情况,表

示感激之情。有一位女学员《湖北日报》曾以《棉花姑娘》为题,登过她的照片,她参加过省劳模大会,见过时任省委书记王任重。她学会写的第一封信,便是给王任重同志的信。信虽然写得简短,但很朴实,富有感情,其中也提到老师们是怎样耐心帮助她们学习文化的。最后表示:要让文化像土一样还老家。只有做了文化的主人,才能做好国家的主人。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了王任重同志的亲笔信。其中谈到“四个月能让不识字的学员疏通文字,并能写简单的书信。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希望再接再厉,继续做好这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省委书记的信我一直珍藏着,未向任何人透露。

我虽透过八年私塾,也读过初中和师范,但总感到自己许多知识学得不扎实,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在学员们学习精神的鼓舞下,我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完高中语文全套教材,做完了课后所有的练习。我还坚持参加哲学学习,并出席过县学习经验交流会,荣获过奖品奖状。扫盲班近两年的时间,我写下了学习笔记厚厚几本。这两年,我在学习上和学员一样,是很有长进的两年,为我后来参加华中中文系本科函授及教中学语文打下了坚实基础,培养了自学习惯和能力。从那时起,我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坚持看书学习两个小时左右。即使开会、下乡耽误了时间,也要利用休息时间及时补上。

第一学期学员结业时,县领导来校向学员征求办学意见。学员们对学校工作给予了肯定,但唯一提到的是办学条件太差,教室阴暗潮湿,寝室狭窄拥挤,食堂和操场也没有,这些情况县领导都很清楚,只是当时来不及解决这些问题。经过商量,很快决定征地扩建校舍。组织上见我1954年重建过校园,要我负责建校。两栋七个教室分前后两排(中间是操场),征地、设计、施工只用了一个暑假

假的时间,顺利建成。原校舍作食堂及女学员和部分工作人员宿舍;新校舍作教室、办公室、会议室及男学员宿舍。我和孙秉文及后调来的江松溪同志住在面积只有一个教室三分之一的宿舍里,朝夕相处,亲密无间。根据我一贯表现及其对我较长时间的考验,组织上于1956年7月1日,经甄素琴、孙秉文同志介绍,全校党员大会讨论通过,报县委组织部审查,并经部长亲自签字批准,我为中共预备党员,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我对组织上给予我的政治生命一直十分珍惜和感激,并暗下决心,努力工作,多作贡献,力争做一个合格的党员。

扫盲班新校舍建成后,扩大了办班规模,继续开办了两期,我照样担任了两期教学任务,到1957年夏末,基本上完成了预定任务。在县扫盲班工作的两年,是我一生中轻松愉快,留下美好记忆的两期。在那里入党并按期转正,政治、文化业务水平有了系统提高,尤其是同事间互相关心,情同手足,和学员的关系也十分和谐。除教他们学好文化外,再没有别的工作压力。那时,我们正值青年,精力充沛,每天晚饭后,都要同学员一起打一个小时的篮球,有时,也和县农校学员举行友谊赛。每周星期六,几乎都到县人民剧场观看京剧。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后,政治运动频繁,人与人之间很难再有那么坦率和真诚,生活上也困难迭起,一直在校长岗位上的我各方面的压力更大。

1957年暑假,县扫盲班完成历史使命而停办。县领导决定利用扫盲班校址创办全州第一所民办性质的“监利群力中学”。为了加强学校的政治领导,同时便于财产管理,要在扫盲班挑选一名党员当政治老师(即党支部书记)。我被留下来创办群力中学,其他几位同志均调县委和政府部门工作。这使我又多了一段为一般教育工作者所不具有的从事民办教育的经历。

欣逢建党100周年,我这名退休党员教师,一步一步感受着共产党的好领导,享受着共产党带来的幸福生活。我的心情多么豪迈,我想把心歌唱给党听。

我的父亲是生产队长,大哥、二哥都是退伍军人,二哥是共产党员,家里政治空气浓浓的。从小,我就爱读报纸、听广播。那些英雄人物、共产党人的故事印在我的脑子里,我经常拿着小话筒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父亲教育我要当一个好老师,二哥嘱咐我要学好教书育人的本领。在他们的熏陶下,我逐渐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该多好啊!我羡慕着那些党员干部,并确立了要入党的目标。

渴望入党组织的秘密一直藏在我的心底。于是,我开始暗暗创造条件,积极开展工作。我刚开始任职时处于大集体年代,待遇上记“靠工”。我一心教书,毫不马虎。暑假里,生产大队组织让我参加培训,我背着米袋子,挑着黄豆梗,步行30多里到区上参加学习,有时还到七八里远的地点培训上课。通过培训,我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白天,我一整天的课程,不叫累。晚上,我教扫盲班任劳任怨。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我长年上门走访调查,登记造册,做好资料。把孩子一个一个接到学校,不让一个孩子失学。家长外出打工,临走时把孩子托付我,我没有让他们失望。

那年月,我们吃住在校,自己种菜,自己做饭。虽然辛苦,但教学井井有条。记得有一年冬天,上水利挖大河,我响应党组织的号召,支援水利建设。在工作空隙,我采写了多篇广播稿送到工地指挥部,宣传身边党员群众中的好人好事,受到了大队干部的好评。我常想,我的初心是什么?一个共产党人,就应该吃苦耐劳。

后来,搞单干了,民办教师肩上的担子重了,但我工作重心的锱铢仍然摆在教学上。我单纯的想着要对党的教育事业负责,要把学生教好。当时我也想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但难于启齿,只是默默而努力。那时是由大队转向单干的过渡时期,几十元的工资成了“除账”,教学上的辛劳,单干生产的负重,外界打工潮的诱惑,我的同事悄悄南下,老伙计们陆续外出挣钱,我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秉承着初心,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畏难情绪。我深刻感受到党对民办教师一直是重视和关怀的,民转公的政策一次又一次作了调整,给予了我的信心和勇气。我一边教学,一边抓紧个人自学。终于在九十年代如愿以偿,转为公办教师。

转为公办教师以后,我教学的激情更加高涨。我身边的村干部一个个入党,我经常为他们办理入党材料,从而也受到党的教育和感染,加入党组织的要求更强烈。因为我爱好采写新闻报道,有一段时间,我被抽调到乡党政办工作。随着党的富民政策的落实,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我也随着“进城”了。在小镇居住,在乡党政办工作,政治学习的的时间多了,党员干部的先进事迹让我深受鼓舞,加之任专职通讯干事,经常行走在村庄田野、农户院落,看到党的好政策在基层落地,我感同身受,加深了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从思想上受洗礼。受党组织的安排,我先后参加了《农村新报》的函授学习,参加了荆州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写稿投稿有了更好的发挥平台,把对党的一片深情融入清新的文字。一年下来,采写新闻通讯报40多篇。工作卖力,吃苦耐劳,我被县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在党办主任的推荐下,我实现了人生最大的理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在教师队伍中,出现了“跳槽转行”“停薪留职”“外出经商”的现象,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抵制了来自各方的诱惑,初心不改,从政府部门回到了我挚爱的学校,继续担任“小儿王”。后来在党的关怀下,我参加了湖北省农村教师素质提高工程培训,业务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全身心的投入,一边教学,一边写作。收获着满满的教学成绩和写作硕果。

而今的农村,党的教育事业迅猛发展,“班班通”“云视频”,纸质与电子结合,活动与课堂衔接。农村教育日趋规范。教师的福利待遇逐年提高。我有着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庆幸自己赶上了这样的新时代。

现在我已退休,享受着党的社会保障的好政策。休闲之余,我仍然不忘初心,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关注乡村教育的发展,报道乡村教育的新进展,为乡村的全面振兴直抒胸臆。回顾经历,展望前景,由衷感叹:共产党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好”!

(作者系监利市柘木小学退休教师)

我唱心歌给党听

□ 曾繁华

他创建了监利第一个党支部 纪念监利革命先烈刘崇龙

□ 邹梁章

公坟廖岭秘密组织了一个共产党小组。

同年刘崇龙在自己家中,以求学武汉的同学为基础,成立监利县第一个党支部。成员有陈步云、段玉林、袁以贤(又名袁少梅、布客等)、邹德容(代号湖广螺山转)、邹涂清、卢子武、陈秀山、张国熙等。籍贯大多是现邹码村、阳光村、韩埠村、龙潭村的进步青年。

革命的星火渐成燎原之势。全县很快建起了6个区农协、61个乡农协,发展会员2万多人。封建地主们不甘心被“泥腿子”所打倒,纠集地痞流氓近千,于1927年元月以“闹花灯”为名,突然袭击县党部,将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后经湖北省党部营救出狱。

1927年12月,监利县党部在县城举办了两周农民讲习所(又称党务训练班),他任所长,培训了学员近200人。

1928年初,参加了周逸群、贺龙召集的鄂中特委、石首中心县委、监利县委、沔阳县委联席会议。

1928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他与陈步云等人,团结当地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坚持地下斗

争。中共监利县委在韩家埠他家中成立(县委对外称“洪湖月刊社”),陈步云任书记,他任县委委员。不久,监利县委与湖南华容的刘革非等人联合成立了“两湖革命非常委员会”,他为负责人之一。同年9月,中共鄂中(南)特委迁至韩家埠他家中办公,刘任特委委员。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自秋至冬,在监利发起了20多次农民暴动。

监利县委书记熊传藻和刘崇龙是具体组织者。处死反动地主20多名。缴获地主武装,反动地会武装枪支百多条,为后面成立农军打下基础。国民党军队对这一行动作出了疯狂报复,出兵将熊传藻和他率领的游击队重重包围。熊传藻掩护突围,不幸被捕牺牲。

刘崇龙率部部分游击队员突出重围,展开反“清乡”斗争,建立了巩固的红色根据地,为湘鄂西地区其他县做出了榜样,受到周逸群、万涛等上级领导者的称赞。

但不遭到国民顽固派一个团的疯狂报复,为抓捕刘崇龙,突袭韩埠村烧毁房屋60余间。现在村里的唯一目睹者当时只有六岁,每当谈起当年的情景还双拳紧握。

在残酷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刘崇龙和他的战友们总结出一套坚持斗争的经验,并形成口诀: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这与当时在井冈山时红军十六字方针惊人的相似!可见成功地建立一块根据地必须有天才的指导方针。

1930年12月,在沔阳县白庙召开群众大会时,不幸被捕。不久,在小沙口壮烈牺牲。对此刘崇龙之孙刘运武有这样的描述:“国民党真是灭绝人性,噩耗传到1931年底才得知。我年近八十岁的太爷爷只得打起精神抚育我的父亲,我太祖母因此一病不起,再也不能为党组织站岗放哨,再也不能支撑这个大厦崩溃的家。”

黑茫茫茫茫四方,九州凄苦尽豺狼。哀风涛怒洪湖水,腥雨潮湘云梦浪。壮志满怀求学路,探踪跟党举旗扬。涅槃丹凤得真理,浴火重生返故乡。刘崇龙在监利红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是董必武介绍入党,在短短五年的党龄中为监利革命、为洪湖苏区、为湘鄂根据地打下良好的基础。监利人民永远怀念刘崇龙!